

想像现代性

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

董丽敏 著



(一〇)二卷之後，遂刊印在石版上。原氏又發願刊印的不幸竟死，也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想像现代性

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

董丽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董丽敏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

ISBN 7-5633-6148-0

I. 想… II. 董…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41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00mm 1/32

印张:8.25 字数:210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出版说明

该套系列教材是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本年度的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二级学科所属的主要选修课。通过这些选修课教材的建设,达到如下几方面的目的:

一、促使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为本科教学的内容,增强本科教学的学术含量。

二、更新选修课的教学内容,把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与基础教学结合起来,拓宽本科学生的学科视野。

三、使本科学生掌握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方法,提高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

四、提高本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精神、深厚文化素养和较强社会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在上海市教委、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各级领导的指导下,上海大学中文系正在为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的建设而努力工作。相信该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中文学科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期盼得到各级领导和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系列教材
编辑委员会

导论：“现代性”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意味着一段忧患深重、总在寻找出路的岁月,意味着踏上暧昧不清的“现代性”的崎岖之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意味着种种逼仄的生存夹缝:文明/愚昧,先进/保守,启蒙/救亡,传统/现代……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可以说,“现代性”都是笼罩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土壤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它是指向富强、民主、自由的美妙理想追求,然而语境的差异却使这种追求充满苦涩;它是摆脱危机、企图自救的拯救冲动,然而这种冲动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却常常顾此失彼……尽管如此,在始终没有完成的中国式的“现代性”问题探索中,仍然凝聚着国人始终高涨的狂热追随,它是如此浓烈、如此铺张,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任何角落都感受到它无处不在的痕迹。

比如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学期刊。

作为“现代性”问题在文学上的投影,“现代文学”及其载体“现代文学期刊”,某种意义上,毫不迟疑地规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学期刊应有的使命、内涵与归宿,因而在二十世纪很长的时间内,“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期刊”都是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学期刊不言自明的指认者、替代者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现代文学史”。而作为其载体出现的文学期刊,似乎也因此摆脱了诸如商业追求之类种种现实的功利性目的,脱胎换骨成为一种纯然追求“现代性”的精神产品。可以说,“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期刊”自命名之日起,无疑就与现代性问题所带来的欣喜与迷障紧密地纠集在了一起。

较之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文学”长期以来犬牙交错难

舍难分带来“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学术困惑与迷津,“二十世纪文学期刊”与“现代文学期刊”这一对概念,其间的差异与裂缝可能更为明显,也更容易让我们把握到以下几个问题:“现代性”的命题是如何赋予文学期刊的?文学期刊又是通过哪些方面的努力,建构起自己的现代风貌的?“现代文学期刊”又是如何遮蔽、消解作为刊物特性的商业追求的?“现代文学期刊”所营造的“现代性”与作为学理规范的“现代性”之间是否完全一致?等等。

对于像《小说月报》(1921年之后)这样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期刊”的个案研究,也许能够另辟蹊径,从一扇不为常人所注意的窗口中让我们窥探到某些独特的风景,某些耐人寻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景观。

“现代性”:想像与现实

作为一个逻辑前提,“现代性”即使在西方,也可以说是相当令人困惑的一个概念。著名学者汪晖曾经考证了“现代性”的基本内涵:

现代辞源学证明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涵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①

很明显,撇开那些至今争论不休的方面,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其核心应该是历史进步论影响下的时间观念,它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随着生机勃勃的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到来,随着物质财富的急剧积

^①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累,随着以中产阶级伦理道德为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人们比照历史对当前社会发展成绩的一种肯定。归根结底,这种历史进步论显然是建立在物质生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的,是人们由此诞生的对“文明”、“理性”、“科学”信仰的产物。

放在不发达国家的语境中,“现代性”的问题无疑就更为复杂,一方面,“现代性”追求中相当明显地折射了以中国为典型个案的不发达国家那种明确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冲动,那种希冀通过社会变革在社会体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包括社会舆论、国民素质方面跟上发达国家前进步伐的企图,那种自身由此强大以后摆脱被奴役、被欺凌屈辱历史的努力。其具体表现为:

在政治上囊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在思想上依托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和近代以降的科学民主观念,尤其是历史进步论观念,在文化上产生了白话文运动、新启蒙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上产生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底蕴的审美观。^①

一言以蔽之,“现代性”追求差不多完整地展露了不发达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蓝本,设计一个理想现代国家的全部梦想。这种梦想落实在“进步论”上,是与西方式的现代性理解相通的。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现代性”追求中,却也相当鲜明地流贯着不发达国家本身的自省与惶惑,那就是往往基于自身的价值立场与现实国情,对明显打着西方强国烙印的“现代性”适应不发达国家的土壤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对不发达国家追求现代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被殖民倾向保持一种批判的立场。

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性下,不发达国家的现代性追求就呈现出某种分裂性。一方面,从学理层面上讲,“现代性”的概念分明只能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作为参照系,对其诞生、影响、作用做缕析。因而,不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自身立足点对其做的某些梳理,从根本上来说,恐怕只能如李欧梵所言,是基于一种历史进步论观念,对西方的现代性进程

^① 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第325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与理论,所做的一种“想像”。^①也就是说,不发达国家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现代性”,或者说那种谈论“现代性”的兴趣本身,从一开始,就已自觉不自觉地熔铸进了不发达国家的某些现实需求。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下,“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梳理,在不发达国家里,就注定了不能完全沿着严格的学理程序来进行,就注定了和西方学者眼中的“现代性”有着严重的分歧,一种想像与事实对照时必然形成的巨大落差。

另一方面,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可以说,它基本上是沿着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缓缓前行的。这一点,在汪晖那篇著名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已经阐述得相当充分。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社会从其价值目标来讲,也许仍然以西方式的“现代性”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但实际上,其到达这种“现代性”的途径也好,方法措施也好,其实可能是非常中国化的,甚至是反现代性的。^②这种目标与方式之间的矛盾对立,同样决定了以单一维度、单一视野的西方化的“现代性”理论来涵盖中国社会的实际进程,是相当危险的。它不仅不能真正说明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甚至也不能表达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真相。

鉴于这样的混乱情形,对于“现代性”概念的缕析便只能分成若干层次来进行。按照我的理解,“现代性”至少可以划分成西方式的现代性与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所认同的现代性两个层面,就后者而言,又可以划分为学理上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实际进程中的现代性两种。就中国社会的接受来看,西方式的现代性理论尽管可以说是首先激发起了中国的现代化梦想,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真实图景却是由打上本土印记的中国现代性理论来完成的,而出于种种原因,真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代化的实际景观,却也可以说是对本土现代性理论的一种修正、颠覆或解构。

因此,假如我们仍然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话,我们的关注视野恐怕就会因此而发生变化。现代性及其景观就不可能作为只有唯一内涵的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更关心的,也

① 有关论述可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53—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具体论述可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5期。

许是不同背景之下的几种现代性之间互相纠缠、互相影响的复杂情境，以下的一些命题由此脱颖而出：西方式的“现代性”是如何影响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对于民族国家的想像的。在想像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前，不发达国家的学者又是如何建立起某种学术规范，来加以弥合的。包括大学、出版机构、刊物等在内的文化机构，在这样的弥合中，又到底起到了什么独特作用；它又是如何在自身的学术或商业立场与“现代性”想像发生冲突的时候，来调整自己的。

像《小说月报》这样的刊物由此才成为我们把握“现代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现代性与现代文学

搁置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可以发现，较之于其他文化产品，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更为密切。

可以简单缕析一下“现代性”与“文学”扭结在一起的历程。

应该说，自梁启超高举“小说界革命”大旗开始，文学事实上就开始与现代性扭接在了一起。那种“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一国之政治，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言论，明白无误地将文学放置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变革洪流中，文学的变革也因此必须由现代性的理论来加以阐述。

到了五四时期，这种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结更为紧密。在那篇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檄文《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是这样来理解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的：

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①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平原、夏晓红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第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吐故纳新的意义上,可以说“革命”最能体现以“历史进步论”为核心的“现代性”的要求,因此,将“文学”与之相关连,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革命”的结果,无疑,作者就是将不发达国家所瞩目的那种“现代性”的内涵赋予了文学,文学史因而就与文明史、革命史等放到了同一层面上,被放逐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中。

可以说,陈独秀的这种“现代文学”观念基本上设定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内涵,即新的文学样式必须将文学的自身发展与社会现代性进程无比致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以无条件服从后者的需要作为自己质的规定性。一般来说,作为诠释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现代文学”,除了当下时间(二十世纪)这一不言而喻的规定性以外,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文学”概念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首先,“现代文学”观念完整贯彻了“现代性”追求是建立在“历史进步论”基础上的不发达国家现代性理论的基本思路。胡适为文学革命设定的逻辑前提是这样的: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①

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②

也就是说,在胡适等人的观念中,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发生,白话之所以能取代文言,其最有力的依据就是“历史进步论”。无独有偶,革新后《小说月报》的第一任主编沈雁冰,在大力推广“自然主义”的时候,也紧紧地依附在“历史进步论”这一核心理论之下:

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②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

我们如果承认现在的世界文学必要影响到中国将来的新文学——换言之，就是中国的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的路上——那么，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一过之必要；特是自然主义尤有演一过之必要，因为他的存在时期虽短，他的影响于文艺界全体却非常之大。^①

很显然，对于“五四”这一代学人来说，“历史进步论”已经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普遍规律呈现在他们面前，因而以其来解释当前文学的方方面面，不仅是一种阐释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视为文学终于改弦易辙，成为社会生活的某种推动力乃至加入世界文学合唱的一种必需。自晚清以来一直蔓延着的危机意识、救亡意识终于借着新文化运动的机会，与文学邂逅。从此，自觉参与社会变革、直接推动历史进步，就成为文学义不容辞的职责与使命，成为文学告别所谓的旧文学时期迈向“现代文学”的必要条件。

应该说，历史进步论作为一种由社会历史语境生发出来的理论，在某些特殊时期应该还是发挥了其特殊作用的——比如说像“五四”这样的社会变革时期，在名教纲常几乎成为停滞不前的意识形态束缚着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与思想的情形下，以历史进步论作为新的社会历史理论，某种意义上，就可以打破历史的停滞状态，以全新的现代性图景激发起人们变革现实的勇气与力量。但是，如果将历史进步论作为历史行进的唯一解释途径来看待，其缺陷又是显而易见的——往往会堕入到机械主义与盲目乐观的泥潭中去，在对未来的乌托邦幻想过于信赖的同时很容易流露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

把这种以历史进步论为核心的现代性理论当作文学的基本追求，毫无疑问，文学不仅要承担历史进步论理论本身已经隐含着的某些缺陷，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把外在于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当作文学自己的发展规律所带来的“现代”与“文学”之间非自然性扭结的裂痕，以及由此给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一，强调文学存在的当前性即文学存在

① 1922年2月致周赞襄信，《小说月报》13卷2号。

的合理性,强调时代性是文学变革的主要理由,必然造成新文学与本国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紧张,造成新文学最终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割裂。其二,必然会引进新的文学参照系,将异域文学发展路径当作本国文学的必然历程,将异域文学的现状当作本国文学学习的典范。也就是说,历史进步论带给新文学的,其实是摒弃了本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而只是截取了当前文学这一段纳入到世界文学的发展中,从中明显暴露出不发达国家的学者以急功近利姿态奔向未来的心态。而其中文学自身异化的气味亦是清晰可辨——所谓的世界文学视野,其实是一种相当生硬的横向移植,是以排斥文学自身的特性、资源作为代价的;所谓的现代性追求,其实社会性、实利性成分的弥漫早已扭曲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其三,必然造成文学远离其审美本体,而更多的以文学实际的社会效应作为评判文学作品价值高下的标准,必然造成外在于文学的环境性因素,如语境、使命、责任等之于文学的强迫性压力,使得文学走向自身的扭曲。

正是在这样将“现代”与“文学”简单叠加在一起的思路下,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文学”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也基本上覆盖在社会化的“现代性”上,而更多的将本体的“文学性”撇在一旁。就文学观念而言,“现代文学”最初也是最为典型的表现个案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一时的启蒙文学观。明显带有异域色彩的启蒙文学观,之所以成为“五四”新文学观念的主流,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着眼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立足于现代公民形象的塑造,打通了文学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壁垒,使文学完全融入到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中。在启蒙文学观中,毫无疑问,国家、民族所遭遇到的危机是压倒一切的,文学者被先验地设定为先知先觉者,一个至少具有现代性意识的不发达国家的理想公民,其自身的定位、使命、价值指向等都被收拢在“现代性”之下,尽力配合外部世界的变革成为文学变革的最重要理由,改造国民的灵魂成为文学者最重要的文学命题。可以说,启蒙文学观之于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等级秩序设定所赋予文学启蒙者的价值衡量尺度,从一开始就是外在于文学的,体现出历史进步论的鲜明痕迹。只不过在启蒙文学者的眼中,社会的进步、国民的进步要与文学的启蒙功能的发挥紧密结合在一起罢了。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由此就成为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先导和有机组

成部分,成为一个在“现代民族国家”梦想之下渐渐脱离自己正常轨迹的异化物。

在以社会化的现代性追求为基本内涵的启蒙文学观念的影响下,“现代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也就脱颖而出了。自然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经过改良的自然主义,成为诠释启蒙文学观最合适的载体。之所以如此,正如它的大力提倡者沈雁冰所直言不讳的那样,首先因为自然主义可以说代表了二十世纪初西方最新的文学进化结果,对于处处以西方现代化图景作为典范的不发达国家文学者来说,最新出现的自然主义当然就应该成为目前中国文学追赶的目标。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不发达国家的文学者分明在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中,体味到了与自己设定的现代性社会理想心心相印的地方。以自然主义为创作方法,其追逐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一种基本上与客观现实难以区分的“真实”。这就是说,启蒙文学者的最高文学理想无非就是,在文本中创造出一个几乎等同于客观现实的世界,这样,读者在面对这样的文本世界的时候,很容易将其与现实世界对应起来,这个世界所表现出的污秽、丑陋、罪恶、不平,也就很容易被读者信以为真地当作真实世界的一种特征。因此,通过自然主义,文本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客观世界的某种浓缩或延伸,文学者创作这样的文本世界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在象征的意义上,进行着某种以改造国民为核心的社会改良行为;读者阅读这样的文本,自然也就是一种灵魂被唤醒、被震撼的过程,也是间接地向理想国民进发的过程。这样的话,通过想像这一中介,文本就被置换成为现实,作者与读者渐趋同一,他们就都被毫无例外地放逐到了现代性的洪流中。

就人物形象而言,“现代文学”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知识分子与农民,作为“现代性”命题最主要的承载者,作为启蒙者与启蒙对象最明确的体现,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的重点。正是被搁置在“现代性”这一永恒的情境中,随着时代语境以及“现代性”理解的变化,知识分子的角色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难以赋予确定的价值评价。在“现代性”被主要理解为落后国度向先进国家追赶的比附历程的时候——比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作为理想国民的形象出现,间或有反思、批判,也基本上把他当作一个时代无法超越自身的致命缺

陷的代表来处理,知识分子由知识、视野所堆砌起来的“现代性”优势应该是其他社会阶层所无法企及的。但是,一旦“现代性”被理解为一种落后国度内部具有自省意识的现实反抗行为的时候——比如说土地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所独有的那种知识性优势,便不仅不能被看作是不发达国家现代性进程所需要的成分,相反,却成为阻挠其与所谓真正代表这种现代性进程的民众之间进行交流、转化的障碍。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失落乃至扭曲的过程。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相对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只能被看作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现代性追求陷落的一种反讽式的记录。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农民形象的特殊关注。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农民形象经历了一次从被历史压抑到浮出历史地表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四时期,基于比附西方式现代性的发展需要,以农民为代表的民众是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呈现在文学图景中的。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当现实情形中不发达国家的现代性进程逐步从西方式的现代性进程典范中逐步脱离出来后,负载着不发达国家苦难历史同时也孕育着不发达国家反抗动力的下层农民,终于摇身一变,蜕变成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主体。从农民角色内涵的嬗变到价值评判尺度的调整,中国现代文学对农民形象所做的不同阶段的书写,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使自身逐步走出了西方式的文学现代历程的阴影,更鲜明地表露出不发达国家确立自身文学现代性特质的努力。只是,之于这种努力,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似乎过于乐观了,更多地撇开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将农民的行为当作不发达国家独特现代性确立的一种表现。这样的话,这种现代性追求同样也就面临着价值尺度评判的艰难。

基于上述种种,就形式追求而言,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只能以大众化、通俗化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进行的若干次文学大众化的讨论、三十年代抗战文艺的盛行、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及至新中国建立后的若干次群众性文学运动,无不印证了通俗化、大众化是现代文学至少是形式追求的主要目标。直白浅显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富有民族特色的技巧运用,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追求

的主要形式特征。很明显,这种现代文学的形式追求同样是以现实世界的需要为归宿的,与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基本上是颇有距离的。这无疑再一次证明了,尽管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社会的现代性追求一开始就被设计为可以并行不悖、相生相伴的,实际上,在不发达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中,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压倒一切的情形下,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追求总是被放置在被动的、次要的位置,总是要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束缚、涂改乃至扭曲,直至以从属者的形象与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能够完全同一。

现代性与现代文学期刊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形相仿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的格局中,之所以有一些刊物被言之凿凿地命名为“现代文学期刊”,同样有着相当耐人寻味的意味,同样可以理解为各种语境、各种力量、各种需要之间紧张对峙乃至冲突、妥协的结果。

如果发表于1918年的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首先是发表在《新青年》这样的社会综合性期刊上,而并不是发表在真正的现代文学期刊上。这似乎是在暗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诞生与其说是与文学期刊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还不如说,更多是与社会、国家命运的现实进程这样的现代性需要联系在一起。

这就注定了“现代文学期刊”的出现乃至运行,必然是命运多舛的。按照一般文学史的理解,现代文学期刊似乎就是现代文学及其相关文学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其论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现代文学期刊必然是某种“现代”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晶。比如说,《小说月报》与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创造季刊》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新月》与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等等。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期刊都相当自觉地承载着某种它所认可的现代文学思潮,当然,这里的“现代”其所指可能并不是一样的,有西方式的与不发达国家理解的差异,也有外部世界与文学自身现代性追求的不同。但不管怎样,任何一

种现代文学思潮的被负载,似乎就已经决定了这种文学期刊的现代性价值。

其次,现代文学期刊的运行必然是与“现代”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在五四时期特别明显。《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与创造社,《新月》与新月社,《语丝》与语丝社,等等,无不说明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与文学期刊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一般说来,总是有了文学社团,然后才诞生相应的文学杂志。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形下,文学社团成员的文学观念、美学倾向、艺术追求、文学活动,等等,基本上就决定了刊物的倾向与立场。因此,现代文学刊物的运行史某种意义上似乎就成为了文学社团或流派兴衰成败史的一种诠释。

再次,现代文学期刊基本上是现代作家作品的集合场。作为发表的阵地,刊物必然要与作家、作品发生关系。一个刊物的基本作者群落、发表的有影响的作品、提出的有争议的命题等,构成了刊物的基本面貌。而依据常规的看法,文学期刊只是提供作品附着的载体,因而它只是属于形式范畴的东西;而作家、作品往往是作为期刊的内容、本质出现,似乎刊物的实质主要是通过作家、作品来体现的。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一份刊物之所以能被赋予“现代”的桂冠,主要是由刊物承载的内容(作家作品的立场)的现代性决定的。疑问就在于,文学期刊本身是否真的只是作为一个近乎透明的载体出现?文学期刊的运行是否就是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社团等文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学期刊真正特性的考察由此成为一个突破口。事实上,如果客观地考察一下文学期刊得以诞生、运行的种种因素,会发现,在上述文学性因素之外,另外还有一些常常被人所忽视的物质性东西,有些时候它们甚至比上述文学性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刊物的面貌。

比如说,出版机构之于刊物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应该说,无论是什么刊物,都离不开出版机构在资金、宣传、发行等方面的支持,自然也就无法摆脱出版机构出于各种考虑施加给它的种种束缚。首先,是刊物的基本立场。像商务印书馆这样政治背景淡漠、经济实力雄厚的民营出版机构,往往就会从长远发展着眼,要求自己旗下的刊物(包括《小说

月报》、《东方杂志》这样的老牌刊物)保持温和中立甚至有些保守的现实立场,尽量不卷进各种政治、社会、文化的纷争中去。而像亚东图书局这样实力微薄的小型出版机构,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尽快站稳脚跟,就会出版一些观点尖锐、辞藻锋利因而寿命也奇短的刊物,如《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以尽快吸引住读者的视线,达到短期牟利的目的。可以说,不同的刊物之所以有不同的风格、立场,出版机构的需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是刊物的基本作用。尽管刊物产生的实际效果可以是多方面的,毋庸讳言,出版机构在创办一个刊物的时候,肯定就已经在自己的总体发展规划中,给予了它一定的使命。比如说商务印书馆在设立众多刊物的时候,就有过种种明确的任务划分,像《东方杂志》就被划入直接赢利类,《教育杂志》就应该以广告宣传效应为主,《学生杂志》应该自觉培植读者,等等。^①可以说,被赋予这样的任务、使命,必然会给刊物的发展带来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基本上决定了作者群的招募、栏目的设置、文章的风格等刊物的总体脉络。

再比如说编辑。作为与刊物关系最密切却又总是隐身于刊物背后的人,编辑之于刊物的影响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从办刊方针的确立、作者群落的建构到读者市场的引导,刊物的各个运行环节都活跃着编辑的身影。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刊物就是编辑的编辑思想、社会活动能力与商业素质集中体现的结果。就编辑的编辑思想而言,应该说每一个编辑都有自己对于刊物的理想设计,以《小说月报》为例,古文学家恽铁樵与西学颇深的新式知识分子沈雁冰,编辑思想肯定是相去甚远的,刊物的面貌自然也就迥然不同。就社会活动能力而言,作为一个优秀编辑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有无良好而广泛的社会关系,这决定了他是否能够招募到刊物所需的最好的作者群落,还决定了他是否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话题以充实、调整版面,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有序的人际网络推广下去,等等。在这方面,同样可以以《小说月报》为例,具有鸳鸯蝴蝶派背景的王蕴章与主要倚靠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当然也就有着本质的区别,《小说月报》前期为何鸳鸯蝴蝶派气息浓厚而后期却始终高举“为人生”的旗帜,编辑身后的

^① 具体阐述可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